



明年将在上海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博物馆,日前正紧锣密鼓地进入布展阶段。作为其中童书馆的学术策划,我觉得理应将新中国第一家以儿童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大型综合性专业少儿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列为重要展出内容。

由宋庆龄题写社名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2年12月28日成立,迄今已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光荣历程。出版社组建伊始,就选址在延安西路1538号,那里有一栋风格典雅的小洋楼,还有一片草坪,一个水池。这栋小楼,这片草坪,这个水池,给几代少儿社员工以及众多的作者、读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应市政建设需要,小洋楼被拆除,之后盖起了一座十多层的少儿出版大楼。

这是只石狮子吗?

为了呈现历史的原貌,我希望能找到小洋楼的照片。我想到了少儿社的《少年文艺》资深编辑单德昌,他是个有心人,精心保存了许多有关少儿社的资料。果然,他真找到了一张小洋楼的南立面全景照。策展设计方看过后,根据这张照片制作了一幅精致的素描画作为展品,当我拿到交融了历史和艺术的绘画后,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我随即发给了单德昌。不料,他看后问我:“小洋楼台阶上的石雕是只石狮子吗?”这样的设计,让我直觉有种不确定感。我和设计方仔细对比原照片,发现那个石雕确实面目不清,只能说看起来像是只石狮子。

但我认为史实不能模糊,不能似是而非,即便这里改放过别的石雕,也要能说得所以然。于是,我将照片给到几位少儿社年长的老编辑,请他们一一辨认,结果都是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过,曾在少儿社工作多年,后调任中国中福出版社的陈苏给了我一个重要的线索——她发来一篇署名王亚法的回忆文章,写了他在少儿社度过的那些时光。

王亚法是1976年元月进入少儿社

工作的,直到1988年才因出国而离开。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少儿社这个地方,原先是古代墓园,二十世纪初,英国籍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在上海发迹,建造了名闻遐迩的哈同花园,后来,他的养子戴维·哈同买下了这片墓园,并在园中靠马路一侧建造了一幢别墅,这便是以后少儿社使用的小洋楼。当时,戴维·哈同将墓园里的一对石麒麟放置在别墅南面,也就是号称阳光房的台阶前。王亚法写道:“我七十年代进社的时候,那对麒麟还在,但两块石碑移到了草地边,一块打碎,做了底座,另一块横卧其上,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了。”而据长宁区文物局记录,这里原系明代天启年间副都御史李同芳的陵园。

我将这条线索告诉了那些老编辑,他们纷纷想起来,说还有石马、石龟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草坪和水池重新修整时,更是新建了一座假山、一座亭子,从假山里面穿进去,可以通往亭子,坐在亭子里观赏风景,实在是心旷神怡。单德昌再次从保存的资料中找到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那是1982年戴维·哈同的后人从国外来上海寻访长辈住过的地方时拍摄的,地点就在小洋楼的阳光房前。我看见合影里有少儿社的老编辑刘崇善,便让他辨识,他立刻回想起来,说他曾将那天接待的情况写成报道,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证实了曾置于门前的古代石雕不是石狮子,而是那对麒麟,当然,由于年代久远,的确面目模糊了。

麒麟者,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之九子之一也,是一种祥兽,也称龙龟,外形似龟,善驮重物,多用以驮负碑碣,寓意经久不衰,其文化涵义则是象征长寿吉祥。我请策展设计方将石狮子改为了石麒麟。我想,我们还还原历史,是为了尊重历史,认识历史——我们是从过去走来的,我们还要向未来走去。

巧遇“二杨”

孙琴安

我们小时候心目中的明星,除了白杨、赵丹、秦怡、孙道临这些著名电影演员,还有一种明星,那就是劳动模范。像王进喜、时传祥、黄宝妹,包括下乡知青模范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绝不亚于电影明星,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榜样,受人爱戴,令人尊敬。

在上海的劳动模范中,纺织工人杨富珍和客轮服务员杨怀远都是大名鼎鼎的,二人的模范事迹家喻户晓。他们的先进事迹曾感动过无数上海市民,我们从小就是听着他们的名字长大的。有幸的是,我曾与“二杨”有过一面之缘。

十多年前,我受邀参加一本诗集的发布会,地点在中共一大会址。当我提前来到会场时,已陆续来了一些人,我在第一排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旁边已有两位七十多岁的长者安静地坐着,与年轻人的热烈交谈正成反差。我一看,这不是杨富珍和杨怀远吗?毕竟初见,不敢造次,便也学着他们俩安静地坐着。

来宾逐渐增多,周围的人也顾不上交谈, newcomers也许都不太熟悉“二杨”,竟无一人前来与两位劳模明星打招呼。此时我觉得有点冷落了这两位大人物,便主动上前与“二杨”搭讪攀谈起来。两位劳模刚才还是分外安静,而现在一旦与你交流起来,一股热情亲切的感觉迎面扑来,真诚质朴,顿时令你如沐春风,心生暖意。我一边握着他们温暖的手,一边作自我介绍,迅速拉近了距离。

由于我就坐在杨富珍边上,与她的大媳妇孙玉珍又是朋友,因此与杨富珍谈得更多一点,也谈到了她的家常,她惊喜地说:“哦!原来你都知

道。”我看会议上就要开始,提议希望拍个合影照,他们一口答应,并执意要我坐在一起,我坚决不依:“你们是前辈。”结果站在他们背后合影,留下了珍贵的一刻。

事后我把照片加印托孙玉珍带给了杨富珍。后来孙玉珍见到我时说:“我婆婆收到合影照了。她还记得你,记得那次活动,托我向你问好!”我也托她代为致意。然后她说:“你别看她对我们小辈很关心,其实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的。平时对我们再三关照,不允许我们在外面的名义和旗号,做任何事,就像家规似的。”

她说此话时,其实是敬佩的。去年,当我从电视里看到杨富珍和杨怀远的面容时,感到分外亲切。他们都是为党为民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党员,都能像他们一样,那该多好啊!

1978年夏天的一天,我正犯愁阿根廷世界杯决赛那场球在哪观看。这场球对我和当时一大批的足球爱好者们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和吸引力。我的邻居又是同学周智儿邀我前去看他观看当天的比赛,我不禁期待……

在周柏春伯伯家看世界杯

朱效来

当我来到新闻路一间不起眼的民房三楼客厅里时,周柏春伯伯和他的两个公子已经就座在位置上,前方放着一台九英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机,在当时一个家庭有这么一台电视机已经很难得了。随着比赛的推进,我们的心也随着场上的变化而起伏,听着宋世雄在香港看着卫星现场转播,他清脆、明亮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

周伯伯对场上的两支隊伍已经非常熟悉了,对荷兰的出色表现赞不绝口,对另一位荷兰著名球星、有无冕之王之称的克鲁伊夫过早退出荷兰国家队深感惋惜,荷兰国家



花 (水彩画) 丁芊

队两次杀入决赛,最后都未能捧杯,甚为可惜。周伯伯不断地说:“国家队小伙子们有这么好的脚法、球技就好了……”

上半场休息的时候,周伯伯兴奋地上台与我们说起,早些年他年轻的时候就看足球比赛,对一代球王李惠堂人品和球技赞赏有加,肃然起敬。抗战胜利那年,宋庆龄女士还邀李惠堂率当时的南华足球队来沪表演。

那天,周伯伯和我们一起在现场观看,举手投足间我们几个小辈很是感动、鼓舞。

周伯伯与我们闲聊道:“我们在舞台上也是一个团队、一支足球队。我们在舞台上演出一台大戏,例如《满园春色》,每位演员在不同

到蒋先生的脸。我问为何不上前一步?蒋先生说道:他们都是文学前辈。从细微处,我看到了谦虚的美德。

蒋先生平时话语不多,他把精力花在学术研究里;热情用到爱心上了。1991年8月,华东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上海作协发起百名作家赈灾活动。那天,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的作家阵容壮观,表演艺术家白杨(系上海作协会员)也前来“助战”。蒋先生站台

美学家蒋孔阳

陆正伟

忙着为读者义卖,他的那本我曾用作教材的专著也在签售书中,我见了特感眼熟……

蒋先生和巴老同是四川人,相识多年。1997年初夏,他到杭州参加学术研讨会。听说巴老在杭州,便抽空到汪庄探望。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刚坐下,蒋先生便把患帕金森氏病的病情说给巴老听。巴老向他推荐了华东医院神经内科邵殿月主任,然后抬手指指我说:“让小陆给你联系。”

邵主任是神经内科专家,巴老患帕金森综合征确诊后她就开始医治了,十多年来,由于药物控制得当,病情发展缓慢。因此,巴老把她介绍给蒋先生。

我陪蒋孔阳、濮之珍夫妇找到花园里照“全家福”。我把照片洗出来后,在廿多人的合影中找多了时才在于伶和吴强的身后看

合适不过了,他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职业,再者,我还听说他曾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上

过怎样读书和写作的课。我便写信征求其意见。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回复。蒋先生在信的首页没提题词一事。他写道:“正伟同志:您好。来信收到,谢谢。上次看病,多承您联系、安排,邵医生又非常认真负责,所以受益不少。但贱恙是慢性病,一时难于治愈。只好慢慢来。等需要找邵医生时,再来麻烦您……”

看完信,我嘀咕道:请邵主任给蒋先生是巴老牵的线。我则是跑跑腿而已,他却满纸歉词答谢。让我看了心里很过意不去。

蒋先生致读者的寄语题在了复旦大学信笺上,他写道:“人尽其才,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尽了‘人之为人’的本分了。蒋孔阳,1998年4月23日。”他在自己的名字旁还钤了一枚鲜红的名章。我面对题词连连数遍,读着读着,我不自主地用审美眼光把蒋先生寻医问药事联系了起来。巴老病得不轻,仍不忘行善,给病友提供便利。邵主任用她的临床经验治病救人,弘扬人道精神。如此互动,使我看到了一种无形“美”,它在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不是对蒋先生的美学经典论说——“创造论”的最好诠释吗?

今年是蒋孔阳先生逝世23周年,谨以小文缅怀这位远去的美学大师。

前些日子秋高气爽,天不太冷也不太热,笔者和老伴常到沪上几家公园走走,我们发现公园划定的草地上出现了不少露营帐篷。在世博文化公园,我们怀着好奇走进露营地,坐在边上仔细观察:原来大多是祖孙三代,有的一家老小在自家帐篷前,围着一张小桌而坐,喝着谈着什么;有的半躺在帐篷里,传来大人小孩的对话和手机中发出的音乐声;还有的显然刚到,合家忙碌着在搭建帐篷,中年的支起帐篷和拉绳固定,年少的在帮着递物敲柱,老的在搬小桌小椅等物件……各式各样的帐篷在公园里格外醒目,养眼又怡情,忙碌的场景平添了许多蓬勃生气和生活气息。

后来看到文章,原来公园里出现的露营帐篷,只是沪上野外露营热的一个侧面。11月初上海郊外的夜晚,薄寒和微露虽已降临,但各个露营地却依旧对外开放,落日余晖中,只见帐篷林立,烧烤香飘四处。

由此笔者想起了退休前在德国进修时,曾应德国朋友之邀,在房车中野外露宿的经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房车亦然,简直就是一套迷你套房,客厅兼卧室,两用沙发就是床,厨房厕所齐全,还有空调电视。安睡在星空之下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自己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大自然的空气比室内清新,夹杂着青草的芳香和泥土味;四周环境特别安静,似乎听到了大地的呼吸和低声的虫鸣;在睡梦中我仿佛在星空中漫游,感受着夜空的魅力……有德国朋友告诉我,跟多年前野外露营地周边只有水电、淋浴、厕所和小超市相比,现在的配套设施简直可以说不同往日,游泳池、健身房、运动场、像样的饭店和超市、儿童游乐场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还建有高尔夫球场,把原本只是短时调节身心的野外露营变成了休闲健身或者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亲子时光的活动。

野外露营的兴起,也说明了都市人生活观念的改变和对自然生活的追求。还有,野外露营自由随性,花费节俭由人,也是吸引人的亮点。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看到德语文章,说德国人的露营出现了一个“新热点”:德国不少地方,特别是中部地区多雨,刮风下雨败坏了露营迷的兴致,也阻碍了行业发展。于是有关经营者想出了“室内露营”的高招:他们或租用城郊关门的大超市,或自己在野外搭建四周敞开的“大厅”,让露营迷们开着房车或带着帐篷在大厅里过夜,既能遮风挡雨,又可体验露营的感觉。真是“水来厅挡”,一举多得!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不在室外,就不能叫露营,充其量只是体验住帐篷的感觉。



说说野外露营

桂乾元

十日谈

我的世界记忆 责编:徐婉青